



林家骊 著

谢铎及茶陵诗派

启功题 篆

中华书局

林家骊 著

谢铎及茶陵诗派

启功题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铎及茶陵诗派/林家骊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 1
ISBN 978 - 7 - 101 - 06014 - 0

I. 谢… II. 林… III. ①谢铎(1435 ~ 1510) - 评传
②茶陵诗派 - 研究 IV. K825.6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0157 号

-
- | | |
|------|--|
| 书 名 | 谢铎及茶陵诗派 |
| 著 者 | 林家骊 |
| 责任编辑 | 周 旻 刘彦捷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480 千字 |
| 印 数 | 1 - 35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014 - 0 |
| 定 价 | 58.00 元 |
-



明正德十六年刻本《桃溪净稿》卷首谢铎画像



甲申十同年会图卷（局部，左一为谢铎）

相比而為輔也以執以力一旦事異
則雖欲強之有不可得而合者於乎
是豈直兄弟然哉先王之澤既遠而
洙泗伊洛之學不能徧天下惑其似
者失其真執其小者遺其大君之於
臣也以奔走為忠臣之於君也以寵
榮為禮父之於子也以從令為孝子
之父也以姑息為慈夫婦也止於幣
帛聘問以為別朋友也必於刎頸死
黨以為信世賈賈馬田之而莫知其
為道於乎其所以從來者遠矣君之先

桃溪淨稿卷之一

送陳御史序

成化丁亥春三月御史陳君士賢以廷議出督學政于南畿。命下吾同鄉薦紳士往過焉有惜之者曰：天下事有重輕緩急抱蓄如士賢善論列侃侃如士賢謂宜置左右以公天下得失以開道。天子意嚮以復于古之治乃茲歛大用于一方其誰能不齎咨悵惘焉者為士賢喜者則又曰：時哉弗可違士賢而好盡言以招人雖未有至如國武子者然與其一齊殺楚卒置其身于無益之歸無寧為今之行得安焉。

桃溪淨稿卷之三十一

書赤城新志後

方石謝鐸著

右赤城新志二十三卷竇繼竇憲舊志而作故所紀載皆
斷自嘉定十六年始惟圖譜表三卷則兼采舊志以總
要所在而不容以年斷也補遺考異二卷亦因舊志以作
而間及於今初六縣各以其志來上無慮百數十卷諸家
又以其文與詩來者數實倍之而其勢未已堆案山積衰
病之餘茫無下手太守公乃命布衣余秋崖弘德高南郭
紉檢閱叅校以相其役遂開局於方岳書院凡再歷寒暑
而功始告成焉副在書院而正本則上之府於是太守公

南逸老學者稱逸老先生所著有金陵邵陵歸田諸稿若干卷先生與先府君爲再從兄弟某從先生久知先生者宜莫如某獨恨昏闇蹇劣深有負於先生之教不足以窺其遠者大者然嘗聞之立言君子矣永豐羅太史應魁曰黃岩謝侯之守邵革弊政斥惡祠興化俗正人心期年而政成蓋庶幾乎周子之齊化也長沙李學士賓之曰愚得先生作郡湖南時賦訟之外雖細事小役亦夙計夜會寢與食有所不暇然謀身無蹊徑與人無崖谷田廬妻子之計皆無所繫乎其心及其引身而退徜徉容與山林之下則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喻也平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先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

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

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and 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序 一

章培恒

从金末元初开始，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近世文学阶段；它的终结是在1900年。在这个阶段里，对个人权利——现代社会所肯定和坚持的个人权利——已有了某些朦胧的渴求并缓慢地向前进展，由此所导致的个人与环境的矛盾也随之逐步突显出来；这都在文学里获得了相应的表现。同时，在文学领域里，也由原先的以基本真实地（不排斥想象和某种有节制的虚构）抒写作者个人感情的诗文为主体而向着以虚构的叙事文学——戏曲、小说——为主体转化。我国的现代文学就孕育于这一时期。

不过，我国的近世文学可谓命运多舛，不断地遭受打击并因而蹉跌。它所遭受的最早也是最残酷的打击来自明代的洪武、永乐时期。朱元璋、朱棣父子采取了如下三方面的政策：第一，残酷打击经济发达地区和以商人为主体的富裕阶层；第二，不断地、大规模地以各种借口残酷镇压杀戮士大夫或处以其他的严厉刑罚，高启之类不肯为他所用的士人固然首当其冲，最后连对他一心效忠的宋濂及其全家也未能幸免于难；第三，制定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经过他们父子改造的儒家思想来统一全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他对《孟子》的批判改造。他认为《孟子》中“闻诛一夫纣矣，不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之类的话实在大逆不道，而孟子又是儒家中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人物，不好把此人怎么样，便命人制作了一部名为《孟子节

文》的书,把这些话全都删掉,再让天下的士人阅读。可见其文化政策是何等细致周密。他的接班人朱棣命人撰写《五经大全》作为国定教科书,则是对编制《孟子节文》的传统的弘扬。

金元时期的文学中的新因素,本是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发起来的,朱元璋父子既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以商人为主体的富裕阶层进行残酷打击,使苏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满目疮痍,就从根本上断绝了文学中这些新因素发展的根本;再加上对士大夫的残酷镇压和如此严酷的文化政策,文学上哪还有生气可言?于是元代那种戏曲、小说繁荣的局面固然难于再见(只有《水浒传》的最后一次整理本大概是洪武后期或永乐初期形成的,但形成后大概也只以抄本形式在部分人们中传阅,直到嘉靖年间才有刻本),诗文创作也一落千丈。歌功颂德、宣扬程朱理学的台阁体成了诗文的主流。

不过,社会的发展、包括文学的发展都不是个别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任何倒行逆施都只能取效于一时。到了弘治时期,文学上终于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不但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踏上了文坛,元代的戏曲、小说也重新受到了重视——《西厢记》在弘治时期重新刊刻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庸愚子的《序》也写于弘治时期,从这篇《序》中并可看到此书在当时受欢迎的情况。这以后文学就逐步繁荣起来了,最终形成了晚明文学的盛况。

就明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从前七子到晚明文学现已有了不少成果,然而对于前七子的先驱者们情况却还知之甚少。而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重要现象(包括作家、作品)都不是突然产生的,必然有其渊源。如果不知道前七子的先驱者们,也就不能真正说明明代文学从极衰到日渐兴盛的转变。

当然,也不能说在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前七子的前辈李东阳还是在文学史上可以看到的,而且,从明代起就有人以为李东阳与李梦阳的关系相当于陈涉与汉高祖的关系——陈涉首先发难,

汉高祖终于成就王业。不过，第一，李东阳本身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上的贡献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第二，就算李东阳与李梦阳的关系相当于陈涉与刘邦吧，但陈涉的起事也不只是他一个人，至少他还有吴广的有力辅佐，那么，在明代文学史上起着吴广那样作用的人是谁呢？何况在实际上，文学的转型绝不是靠一、二人就能完成的，前七子的先驱者们也绝不会只有一两个人。换言之，对前七子的先驱者们的研究在明代文学史上正是一个非常薄弱、亟待展开的环节。

也正因此，林家骊教授的大作《谢铎及茶陵诗派》在我看来是一部很有意义的著作，因为这使我们对前七子的先驱者们有了较多的理解。

在林家骊教授之前从无人对谢铎作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尽管由于个人的视角不同，这个人所认为的“全面而深入”，在另一个人看来就未必如此；但林家骊教授对于谢铎及其相关文人的这种专门的研究，却无疑做了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工作，使我们理解了在前七子开始活动的弘治时期的前一个阶段——成化及其稍前的时期，文学风气确实已在开始改变，而不只是李东阳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

这对于明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在台阁派独占文坛到前七子兴起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我们对这一阶段实在理解得太少了。倘若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对明代文学的演变的把握就必然存在着若干空白点。

现在，林家骊教授已为我们对明代文学的这一阶段的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进一步把这种探索导向深入甚或对这部著作中的某些看法加以充实，则是后来者的任务。

林家骊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全明诗》的编纂工作，一直担任《全明诗》的编委，于明代文献的搜集整理和明代文学的研究，下了许多功夫。后来由于本单位工作

的需要，转而研治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成了研治楚辞和汉魏六朝文学的专家。他近年来也研治明代文学，在《文学评论》、《文献》、《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甚见功力的文章。作为他的年长的朋友，我除了为他在明代文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外，并预祝他在今后取得更大的成功。